

# 面对大学生就业难,企业更应体现担当

文 川

6月18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栏目聚焦“毕业与就业”话题,分析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探讨破解难题之策。节目中提及的一则事例,因与宁波有关,引起了笔者的特别注意,并由此引发思考。

重庆某高校大四学生郑一诺,早在今年2月份,就收到了宁波一家企业的劳动合同,为此她从重庆来到宁波。据郑一诺介绍,这是一份正式的Offer(录用通知),上面写着三年劳动合同的签约,因未拿到毕业证之前不允许交社保,故先以实习合同的形式签署。没想到在5月10日合同到期的前两天,单位以大环境不好、需减少人员开支为由,单方面毁约了。这让已经错过“金三银四”春季招聘季的郑一诺措手不及,不得不从头开始。她一方面继续留在宁波寻找机会,一方面在网上海量地投递简历,远在重庆的学校老师,也

一直与她保持联系,向她推荐一些可能的岗位。

面对今年异常严峻的就业形势,不少大学毕业生提早行动,期望能尽快找到合适的工作。郑一诺本是一个幸运儿,早在几个月前就基本落实了工作单位并签订了合同,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份眼看到手的工作说没就没了,对她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更令人揪心的是,此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招聘季,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供其选择的岗位将越来越少。相信很多观众为郑同学感到惋惜和同情,并对企业的做法提出质疑。

从企业的角度而言,采取如此之举,肯定有其原因和苦衷,单方面“毁约”,极有可能是迫不得已之举,估计从法律法规层面,也很难追究企业的责任。但不可否认的是,由此对求职者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相信在当前形势背景下,此类案例不会是孤例。笔者以为,类似情形虽情有可原,但应尽量量避免,更不能成为普遍现象。

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就业问题事关民生福祉、社会稳定。面对大学生就业难,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尤其需要企业发挥主渠道作用。毋庸讳言,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很多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吸纳就业的能力有所下降。企业不是慈善机构,在发展过程中,要考虑控制人力成本,注重经济效益,在提供就业岗位方面不能对其过于苛责和强求。但与此同时,企业也应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特殊困难时期,面对大学生就业难,更应体现担当。

面对困难,企业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考虑,适度减少新员工的招录,乃至必要的裁员,无可厚非,但必须综合考量,慎之又慎。不用或者辞退一名员工,对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影响生计的“大事”。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企业切不可过于任性随意。如果一家企业一遇风吹草动,动辄裁员甚至不惜“毁约”,就很难让员工

有归属感。相反,只有多站在员工和求职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做到相互体谅,才能赢得人心,让员工全心全意地为企业服务,在遇到困难时同舟共济。事实证明,一个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的企业,很难走远。

其实,如果换个角度看,困难时期就业难,为企业挑选、储备人才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风物长宜放眼量,当前,为助企纾困,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相信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难关终将过去。企业经营者不妨把眼光放远一点,善于抓住机遇,用相对较小的代价,将更多有用的人才招至麾下,从而为企业日后发展积蓄能量。这对企业长远发展而言,不啻为明智之举。毕竟,企业的发展,靠的是人才。

明州论坛  
中国新闻名专栏

# 帮扶政策就是要解决农民创新的后顾之忧

郑建钢

“草莓按新品种菌株数进行补贴,每株补贴成本价的100%。”蕰农吕赛浓听到补贴政策时,非常高兴:“有了帮扶政策,我在新品种引进上就没有了后顾之忧。”日前,在奉化尚田街道农业特色产业扶持政策实施方案征求意见会上,传来了政策赋能的强音。该街道在人才引进、品种迭代、争先竞优三方面实施普惠补助政策极大提振了农户的信心(6月20日《宁波日报》)。

最近,新东方农产品直播带货视频冲上网络热搜,有网友质疑其

直播间“一根玉米6元钱”太贵。对此,前新东方老师、主播董宇辉回应,“谷贱伤农”,一个东西如果彻底没有利润,那么农村种地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价格不能太低。

仅仅一句“太贵”,过于笼统,没有说到根本上。农产品价格的“贵”或“贱”,农民基本上没有决定权,而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以吕赛浓种植草莓为例:种植5亩草莓,共8个大棚,购买600棵新品种的种苗,总计花费1.8万元;肥料、基质等花费约4.8万元;搭建育苗大棚及滴灌系统,花费6000余元……要是再加上农产

品绿色、有机的认证,包装、物流和营销方面的投入等,真金白银的花费不算少,用吕赛浓的话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

至于投入之后产出的经济效益,则是一个未知数,要由供需状况、市场行情、气候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决定。大把资金投下去的时候,收益根本无法预见。

除了看得见、能够算得出来的成本,还有许多虽然无法计算,但确实是种地人必须要时刻面对的“无形成本”,像品牌效应弱化、品种老化、病虫害率增加等,如果有所忽视,就将面临产业效益下滑、增收遭遇“天花板”等现实问题。

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民的增产增收问题,在引进相关专业人才、引进新品种、建设特色基地等方面进行补助,以激发农民创新动力,推动特色产业迭代,确实很有必要。当然,除此之外,农民还迫切盼望技术下乡,及时掌握现代农业所必需的科学种地技术,以减少种地风险,降低种地成本,提升农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倘若相关措施形成良性循环,市场上质量优而价格合理的农产品就会越来越多,处于产业链底端的农民才能真正做到增收致富。

利人许可或存在特定联系的,当事人主张构成在先权利时,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显而易见,司法已对此类侵权行为的判决实践里,更好地落实到位,让原创者的权益获得法律保护。

近年来,恶意抢注明星、名人商标的案例时有发生,比如钟南山、谷爱凌等都成为抢注目标,抢注者就是看中其广泛的知名度,藉此“蹭流量”作为商品商标来获利,或者将其高价倒卖给其他商家。此类恶意抢注商标行为,对权益人构成不法侵害,均被判以无效注册,抢注者遭到行政处罚。这种快速裁决、判罚的做法,有力遏制了恶意抢注商标的势头,不妨扩大适用范围,对恶意抢注文学作品名称、角色名称作为商标的行为,也实施快速判罚模式,降低“童话大王”等的维权难度,营造鼓励原创的大环境。

# “童话大王”维权13年才成功:商标权益保护亟待加强

江德斌

“历时13年,其间三起三落,终于对成都皮皮鲁猪肉商标维权成功。开始维权时,我54岁。维权成功时,我67岁。人生有多少个13年?还有676个侵权商标待我维权……”6月20日,著名作家郑渊洁接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寄来的裁定书,宣告成都皮皮鲁猪肉商标无效时,他在微博里写下这样一段话(6月21日红星新闻)。

花费13年打赢商标官司,对于“童话大王”郑渊洁来讲,确实不易。显然,这样的维权太过费时费力,也

很难复制,郑渊洁尚且如此,其他人又能坚持多久呢?可见,商标权益保护,难度太大、时间太长、成本过高,往往令维权者苦不堪言。

郑渊洁在创作童话故事之初,就有意只使用臆造名称做角色,并从1993年开始,陆续将原知名文学作品角色名称“皮皮鲁”们注册了280个商标,但截至目前,他和团队依旧裁定书,宣告成都皮皮鲁猪肉商标无效时,他在微博里写下这样一段话(6月21日红星新闻)。

花费13年打赢商标官司,对于“童话大王”郑渊洁来讲,确实不易。显然,这样的维权太过费时费力,也很难复制,郑渊洁尚且如此,其他人又能坚持多久呢?可见,商标权益保护,难度太大、时间太长、成本过高,往往令维权者苦不堪言。

郑渊洁在创作童话故事之初,就有意只使用臆造名称做角色,并从1993年开始,陆续将原知名文学作品角色名称“皮皮鲁”们注册了280个商标,但截至目前,他和团队依旧裁定书,宣告成都皮皮鲁猪肉商标无效时,他在微博里写下这样一段话(6月21日红星新闻)。

花费13年打赢商标官司,对于“童话大王”郑渊洁来讲,确实不易。显然,这样的维权太过费时费力,也很难复制,郑渊洁尚且如此,其他人又能坚持多久呢?可见,商标权益保护,难度太大、时间太长、成本过高,往往令维权者苦不堪言。

克”与内衣等侵权商标,损害原创主角形象,也会误导消费者。

去年12月,郑渊洁宣布创刊36年的《童话大王》停刊,原因是“一心不可二用”,商标侵权让他没有了创作的积极性,“写作没有动力”,怕写出来被别人拿去恶意注册商标。可见,一件商标侵权案要十几年的时间维权,没多少人能够受得了,需要改变这一现状,完善侵权行为的判定标准,提高维权效率。

2017年,国家出台的明确规定,对于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作品名称、作品角色名称等,在作为商标使用时,容易导致公众误认为经权

# 举证责任倒置的开箱视频不合诚信原则

关育兵

近日,广州的郑先生在淘宝购买的一批工业零配件生锈严重,疑为翻新产品,但商家拒绝退款。在双方协商中,商家要求郑先生提供开箱视频,引发网友热议,一度冲上热搜(6月21日《羊城晚报》)。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人会在拆快递时拍视频,这就意味着,网购者很难提供开箱视频。因为没有开箱视频,商家就不认可消费者投诉主张,肯定会引发更多网购者

的担忧。

消费者为什么很少拍摄开箱视频呢?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在于不方便。拍开箱视频,至少需要两个人,一个人开箱,一个人拍视频。网上消费一次,还需要有人配合,这就让网购失去了其便捷的特点。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信任。在长时间的网购中,消费者和电商已经建立起了基本的信任关系,即电商对消费者的信任和消费者对电商的信任,这是电商能够发展的重要基础。现在,商家要求消费者提

供开箱视频,否则就不予承认,无疑打破了这种平衡。这样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家,而是整个电商生态。提供开箱视频这样的要求,无疑会加重消费者的消费负担,很可能让消费者用脚投票,弃电商而选择实体店商家。

有法律人士表示,要求消费者提供开箱视频不合理。作为消费者的举证责任是证明其收到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真假问题。商家如果怀疑消费者存在调包等行为,需要其拿出证据,而不是要求消费者

录开箱视频来证明。商家因为消费者不能提供开箱视频,就拒绝退款,实是本末倒置,把自己应该承担的举证责任转嫁给了消费者。这是不恰当的,也辜负了消费者的信任。

所以,无论从信任角度,还是从法律关系,抑或是整个电商的发展角度来说,商家都应坚守诚信原则,把举证责任扛在自己肩上,无法证实消费者有调包等行为时,就应该为消费者退款。任何推诿,获得的只是短期利益,失去的则是发展机会。

# 建筑垃圾整治:系统施策方能见到长效

戈岩平

日前,宁波市市场监管局批准发布了《建筑垃圾运输管理规范》。据悉,该《规范》为全省首个建筑垃圾运输全过程管理的标准,将于明天起正式实施。

近年来,随着“三改一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轨道交通建设等工作的推进,宁波全域建筑垃圾量呈井喷式增长。建筑垃圾处置问题已成为新型城市化进程的难点、城市运行管理的痛点、影响群

众生产生活的堵点。

如何整治建筑垃圾泛滥成灾,全国大多数地方出台了相关“条例”“规范”,收到了较好效果。但往往好景不长,一般在集中整治建筑垃圾时,不少建设、施工单位或个人、车辆就有所收敛,“一阵风”过后又不同程度地反弹。

这次我市相关部门出台的《规范》,主要从适用的建筑垃圾范围、运输车辆、运输组织、运输要求、车辆字样及颜色喷涂等五个方面对建筑垃圾的运输管理进行界

定。可以预见的是,《规范》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建筑垃圾运输源头把控、有序调度、规范运行。但毋庸讳言,规范运输只是整治建筑垃圾问题的其中一个环节,单靠这一措施很难从根本上治理这一城市“顽疾”。

解决好建筑垃圾的问题,对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推动城市节能减排,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建筑垃圾整治和道路、给排水、生活垃圾处理一样,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

部分。

显而易见的是,治理城市建筑垃圾问题,不是市场监管抑或是城市环卫一个部门或几个单位的事情,而是整个城市治理的系统工程。其中,涉及产生、运输、处理、再利用各个层面,涉及住建、城管、市容、环保、发改、交通运输、公安、国土等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只有所有的环节系统施策、协同配合、有效联动,才能形成一个闭合的建筑垃圾治理链,真正实现建筑垃圾的长效管控和循环利用。

# “闻声定位”应成为120急救的基本功

罗志华

据《扬子晚报》报道,6月13日晚上6点28分,南京市急救中心接到一名女士来电求救,电话接通后只能听到微弱的喘息声,但无法获取患者的地址和病情等信息。危急关头,接警调度员吴西西根据来电定位信息,锁定了患者的大致位置。20多分钟后,在调度员、警察、急救人员三方协作下,成功找到这名求救者,为其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

当前,120急救“寻人不见”是常见现象。前不久,河南一名女大学生突发脑出血,因120延误救治去世,一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相比之下,这次120仅仅根据微弱的喘息声,就能在很短时间里找到患者,的确让人耳目一新。整个过程体现出急救人员高度的责任感,也与该急救中心开通了来电定位功能大有关系。

类似的“闻声定位”,应该成为120急救的基本功。因为不是每个患者都能精准说出自己所在位置,比如,患者若处于昏迷、心脏病、中毒、溺水、中风等突发情况下,报不清或报错地址是常见现象。尤其是,现在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假如120急救中心不练好“闻声定位”和快速找人等基本功,急救不及时导致的悲剧难以避免。

要想做到这一点,最直接的办法是,在急救中心的操作规程中,

普遍使用电话定位功能。当前手机定位技术已很成熟,不仅在公安系统得到充分利用,而且在服务领域的运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比如网约车乘客之所以能够做到一键报警,也与快速精准的定位有关。微信的定位功能,更是定位技术进入日常生活的典型表现。但定位技术并没有在急救系统当中得到很好运用,让定位技术为120急救服务,应该成为一项创新内容。

除了电话定位,还应该开辟更多渠道来快速发现并找到患者。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在北京、江苏、湖北、广东等四省市开展院前医疗急救呼救定位试点工作。此后,不少地方开发并上线带有定位功能的急救小程序,患者若通过急救小程序来呼救,不仅定位不在话下,而且还可为急救带来其他便捷,比如有些小程序有向周围人群发出呼救的功能,便于周围人通过小程序获知情况并及时伸出援手等。这方面的创新与开发,也应抓紧实施。

南京的这次急救虽然让人倍感温暖,却也暴露出120急救普遍存在的短板。信息化时代,“闻声定位”在技术上可行,理应作为提升急救成功率的重要手段。120急救体系智能化建设的巨大潜力有待挖掘,充分利用定位技术,开发出更多急救智能产品,根据微弱的喘息声快速找到患者,就不会成为新闻。



# 高校争相引院士:校长“唯院士”当慎

刘效仁

6月10日,安徽师范大学宣布省委、省政府关于聘任中科院院士李亚栋为该校校长的决定。安师大成为进入6月,继郑州大学、河南大学、重庆大学之后,第4所迎来“院士校长”的高校。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9位院士担任高校校长,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8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院士不能做好校长,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不能像“唯学历”“唯文凭”那样,认为做高校校长就得“唯院士”(6月21日《中国新闻网》)。

专家治校,堪称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尤其当下,高校为创设一流大学的目标驱动,争相引进院士为校长,几成时尚。无论地方政府还是高校,无不希望选择一位更有影响力的校长,以提高学校地位,开创教学和科研新局。就此而言,院士自然具有更多先天优势。他们多是所在行业和领域的顶尖专家,做校长后即可带动学校相关领域的快速发展,对于解决“卡脖子”难题、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以及强化研究型大学建设同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的对接等,有独特优势。

引入院士当校长,亦可打破高校内部人治理的管理弊端。不能否认,在学校内部管理制度方面,有些高校顶层中缺少外部血液,存在“近亲繁殖”现象。这不利于学校长期发展,从外部聘请院士做校

长,可形成鲇鱼效应,有利于改善这一局面。

当然,实践是检验院士当校长优劣的唯一标准。所幸,确有一些院士胜任校长一职,在科教研方面做出不凡业绩,对高校科研成果的落地,起到了积极作用。事实证明,院士自身的专业方向和优势特长,与本校的办学理念和目标更是吻合,越利于院士科研优势的发挥和高校自身的成长。

只是,倘若聘任校长“唯院士”,则显失偏颇。毕竟,术业有专攻,任职有不同。一位好院士,并非就是天然的好校长。院士的学术能力之所以得到公认,考量的是其学术研究的成果。一校之长,更多的担当是管理。管理一所大学,与开展学术研究是两回事。

事实上,国际上很多高校校长是专职的。校长需要全身心投入,需要殚精竭虑,唯其专职方能专心。很多校长即便之前是一流学者,担任校长后均不再从事学术研究,甚至不再带博士生。同时,校长不再进行学术研究,亦可避免利用权力为自己的学术研究谋求更多资源,实现行政权和学术权、教育权的分离。

“院士校长”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很可能影响其对管理学校的精力投入;若从此告别学术,则可能意味着其学术生涯的结束。鱼和熊掌若要兼得,显然需要超人的平衡能力。基于此,假如聘任“院士校长”仅为“增光添彩”提高学校地位,当谨慎行事。